

# 纪实与纪虚:中西叙述学的两大走向

□ 王成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纪实叙事与纪虚叙事,是中西叙述学的两大分支,总体来看,西方是以纪虚(虚构)为始源,中国则是以纪实(实录)为嚆矢的。在中国,历史叙述有着极崇高的文化地位,但是,却在虚伪文学正宗的话语霸权中割裂了这一文化传统,结果,中国人用实在的人和事来反思人类命运的历史叙述渴望被压抑或转移了。针对理论界的重虚构贬纪实的隐形偏爱,我们提出了构建中国纪实叙述学的观点。

[关键词] 纪实叙事 纪虚叙事 隐形偏爱 纪实叙述学的构建

热奈特在他的《虚构与行文》中,提出要注重叙述学中纪实叙事的研究。显然,直至今日,叙述的两个分支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虚构叙事一家的风姿和内容上,热奈特认为,这是一种“以为虚构叙事文的本质即完美叙事文”的“隐形偏爱”。换句话说,纪实叙事文则不是或很难是完美的叙事文。在中国,叙述学的状况更堪忧思,富有纪虚叙事传统的西方,已开始扭转只重视“纪虚”叙事的隐形偏爱,而我们中国时至今日却仍在高扬虚构叙事的大旗,这是一种屈服于西方文化霸权并且反传统文化的内在学理缺陷。现在该到我们清理这一不重视纪实叙事的理论与实践的现象,并构建中国自己民族传统的纪实叙述学的时候了。

—

纪实叙事与纪虚叙事,是中西叙述学的两大分支,总体来看,西方是以纪虚(虚构)为始源,中国则是以纪实(实录)为嚆矢的。毫无疑问,自亚里士多德起,西方诗学就奠定了“虚构”的正宗地位。并统治西方的文学观念至今。在《诗学》中,他提出“诗”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学性,因为“诗”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自孔子起,以史传文学为主体的中国叙述学是把“实录”奉为最高审美原则的。孔子曾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叙事学有着一一条由虚构正宗到虚构纪实并重的发展轨迹,而中国则出现了令人沮丧的由纪实正宗到扬虚构贬实录的演变态势。

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纪虚叙事占有叙述的统治地位。当然,这里的虚构文体,主要为悲剧。小说被纳入其园地还要到千年以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应是情节的“摹仿”者。这里的“摹仿”就是虚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历史学家如果同时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海登·怀

特为纪实叙述学美言不少,提升了历史文本的地位,但是,他也没有摆脱逻辑怪圈,他公开把历史文本称为“文学虚构”。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并得出结论说,当历史学家成功地发现历史事实中隐含的故事时,它们是在叙述历史事实而非虚构。针对柯林伍德的观点,海登·怀特却说:“柯林伍德没有认识到,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能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故事。”<sup>[1]</sup>这里,海登·怀特显系从虚构是文学本质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叙事的。热奈特有一句话,值得深思。他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有诗学的错误,大概就是每种诗学都试图以‘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甚至‘名副其实’的文学代替其准则所适用的,该诗学为此而诞生的文学艺术之一部。从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的意图而言,上述诗学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不称职的。”为此,热奈特指出了“文学性呼唤多元理论的观点”。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虚构诗学理论,仅仅是在悲剧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形式,尽管它是以虚构为文体特征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代替整个文学准则。从“文学性”的多样性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纪虚叙事和纪实叙事两大叙事美学形式的存在。换句话说,纪实和纪虚是叙述学的两个分支,它们之间没有也不应有谁正宗谁边缘,谁有审美价值谁无审美价值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缺少反诘虚构为文学本质的理论,难道说虚构了就是“文学”了?“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时有个老和尚”是虚构,但不是真正的文学。因此,追根究源,我们应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比“历

[作者简介] 王成军(1963—),男,江苏徐州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史”价值高,即虚构远胜于历史叙述的理论进行批判。在此,我们至少应明确一点,虚构叙事并不在文体上优越于纪实叙事。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学者开始走出这一怪圈的同时,中国则自愿套上了本不属于自我的虚构帽子,至今没有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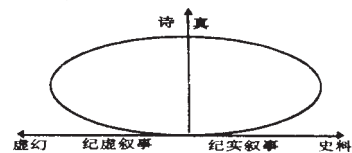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叙述有着极崇高的文化地位,其中最优秀的典范之作是司马迁之《史记》。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指出《史记》“实为孔子的历史哲学的产物”,“这是隐藏在史学结构中的重要个人传记,它不仅仅是个人传记,还是把个人作为各种同类人的典型来描写的传记。”<sup>[12]</sup>(P179)中国的这种重视历史叙述的纪实倾向,曾得到过黑格尔的赞美,黑格尔在赞美中国纪实叙述博大精深的同时,甚至认为印度没有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叙述的国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更加注重历史的史学倾向的班固父子,也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就从理论上认可了司马迁纪实叙事的合法性。我们想,这里不能简单地说,当时“文史”未分家,因为,这“文、史”二字的划分太笼统,作为《史记》不能简单归为“历史”或“小说”。从叙事学来看,《史记》应归为我们所称的“纪实”叙事。也正是从《史记》开始,这一重视历史叙事的传统,代不乏人。这种尊重事实、以实有之事来思考人类全体的命运的传统,不但融入了中国文化,而且几乎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最高追求。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的纪实叙事理论并没有因此而达到自觉,特别是到了唐代“传奇”出现以后,愈发展了纪实理论的滞后,其一是:导致中国纪实叙事理论更加保守;其二是:借史传来抬高小说家的地位。与西方不同,中国论者在叙说纪实中也有虚构时,是以小说的眼光来梳理“史传”的结果,不但未能建构中国纪实理论,反而解构了史传独特的纪实特征。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善叙怪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更令人遗憾的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由于参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虚构为文学本质”论,中国的纪实叙事由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反倒转入了边缘。因此,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虚构文学理论的大展示。令人深思的是,这一学理缺陷却不为国内学者所认识。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观点反倒值得重视。他说:“文章形式在文学,在唐宋以后直至本世纪初,与诗歌形式的文学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但是在本世纪初,其价值被贬低,甚至为文学史家所排斥。”<sup>[13]</sup>然而,这一重视中国纪实叙事的观点仍然被诸多当代学者怀疑。即便出现一些论述纪实叙事价值的文章,也是从小说与史传的关系角度去发现史传中的小说性,或小说中的史传性,重点仍放在小说二字上。所以,我们认为应尽快构建中国自己的纪实叙事学。

## 二

我们认为,纪实与虚构在叙事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区别是前者是“向实而构”,后者是“向虚而构”。所谓“实”

是指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例如:楚汉战争中的刘、项实有其人,垓下之围中的“霸王别姬”实有其事。所谓“虚”是指可能有其人,可能有其事。——至于幻如孙悟空更是向虚而构——例如:贾宝玉是曹雪芹虚构之人,其梦游太虚幻境并无其事可查。这里,从作者与读者的认同关系来看,我们同意菲利浦·勒热纳“自传契约”说,即作者与读者间签定了彼此认同的“契约”。但我们想,仅仅有一个“契约”还不足以约束彼此特别是作者的权力。这里刘知几提出、章学诚补充的“史家四长”和“我们提出的“诗”是保证“纪实”叙事之所以成为纪实叙事的因素之所在(我们将在另文分析),可以用图表示为:



从图中可以看出,纪实与虚构同源于“纪”(叙事),但纪实,是朝着历史真实(史料)方向移动,纪虚是朝着生活虚构(虚幻)一端发展。但同时,纪虚和纪实会脱离其虚幻与史料的横坐标而提升并围绕诗与真的纵坐标而形成一个圆,这个圆,就是歌德所说的纪实叙述学所追求的美学目的——“诗与真”,也是鲁迅称誉《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本范畴,以前把坐标右上侧的半圆所包括的纪实叙述方法归入给了小说,这不但是武断的,也更是“虚构至上”的深层心理使然。让我们举几个名称具体说明之:

### 1、想象

想象是历史叙述的方法之一,但这并不是说,纪实与虚构在想象上没有了区别。事实上,在纪实叙述中,想象是一种保罗·利科尔所说的“复制想象”,是对历史真实事件的“复制”而不是创作一个新的事物的“再现想象”。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纪实叙述中的想象是“肉死像之白骨”。而且钱先生在指出史家叙述的“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推以摩”时,虽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但是钱先生只是说历史叙述与小说可相通,而非相同也。对于这一本质区别,却多被论者忽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真正的历史叙述中的想象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达到小说中的想象同样的美学效果,歌德的《诗与真》就是一个经典例证。卡西尔说得好:“符号的记忆乃是一种过程,靠着这个过程人不仅重复他们以往的经验,而且重建这种经验,想象成了真实的记忆的一个必要因素。这就是歌德把它的自传题名为《诗与真》的道理之所在。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在关于他的生活的故事中已经插进了虚构的成分。歌德想发现和描述的乃是关于他的生活的真,但是这种真只有靠着给予他生活中的各种孤立而分散的事实以一个诗的,亦即符号的形态才有可能被发现。”<sup>[41]</sup>(P66)因此,我们不能说想象是虚构的同义词,因为,没有想象也没有纪实。

## 2. 叙述形式的意义

针对亚里士多德的贬实扬虚的命题。赵毅衡先生说：“这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难题，因为它牵涉到重大的看法，即文学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文学叙述比历史叙述更接近真理，而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比历史更具有意义权力的文类了。”在行文中，尽管赵先生心存虚构至上的“隐形偏爱”，但是他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命题的“偏颇之处”<sup>[15]</sup>（P209），并不得不承认历史叙述的形式意义。但是，在赵先生的行文中仍隐约现出扬虚贬实之意图。事实上，这不仅不是赵先生一人的观点，而是代表当前的一种倾向。如我们说某某小说中有丰富的历史性无疑是对该小说的赞美！但当我们说某某历史叙述有小说性时则成为对该历史著述的讽刺！我们觉得这仍是没有真正看到历史叙述的形式意义。司马迁写《史记》就是有着他的不亚于虚构叙述的旨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叙事是作家展现自我理想、抒发愤懑的主流形式，它丝毫不逊于虚构叙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又一明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受所谓虚构文风影响，用宏大的历史叙述来发表一家之言者，廖若晨星。人们把更多的生命投入到了虚构的叙述。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 3. 语态

按照热奈特的说法，叙事文的语态归结为时态、人称和层次问题。从叙述的时态来看，热奈特指出：“我不觉得叙述行为的时间形势在虚构叙事和其它叙事中有什么先天性的区别。纪实叙事同样也有事后叙事（这也是纪实叙事最常见的现象），事前叙述（预言或预测叙事）、同时叙述（报道），同样也有插入叙述，如日记那样。”热奈特说出了真情。我们不能因为虚构叙述也有这些叙述时态，就说纪实叙述是虚构。这一点上，我想特别强调指出：历史叙述是一种话语语言叙述，它是一种有着主观性的话语形式。不能也不应该用纯编年史学的方法来限制历史叙述，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把小说与历史叙述相同的语态偏向给小说。一般来说，纪实叙述的叙述者与作者的关系是统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当叙述者与作者不统一了就是虚构，就象不能用叙述者与作者统一了就推理出小说是纪实一样。也就是说，历史叙事也可以在语态方面丰富多彩。我们只有在理论上肯定历史叙述的自由度，当代的历史叙述写作才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

## 4. 时间变形

赵毅衡说：“时间变形”是叙述文本得以形成的必然条件。这就是说，历史叙述作为述本是对历史底本的时间变形的有意构型。历史叙述之所以富有诗学价值正源于此，这一点往往被诸多史实学家所反对。我们想，中国历史叙述学的难以形成，与一批史学家的“科学主义”精神有关。事实上，完全复现历史底本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而只有通过时间变形才能形成真正的历史叙述。司马迁的《越王勾践世家》先叙“其先禹之苗裔”，但从禹至勾践之

父近千年，结果司马迁这位叙述者以为无意义仅用“后二十余世”几个字将时间缩短，让越王勾践登上时间舞台。如果历史叙述事无巨细写流水帐，显然是不可能，恰特曼总结底本与述本时间长度变化为五种形式，有利于我们了解时间变形的作用。它们是省略（述本时间等于零且<底本时间）、缩写（述本时间<底本时间）、场景（述本时间=底本时间）、延长（述本时间>底本时间）、停顿（底本时间等于零且<述本时间）。以上几种时间变形，在纪实叙事中都有表现。当然，虚构叙述也采用了诸如此类时间变形，但由此类推历史叙述是虚构叙述是违反逻辑的。

最后我想总结说明以下三个观点：首先，在构建中国纪实叙述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克服两个“至上”即“虚构至上”和“科学至上”的偏执。历史叙述不是虚构，我们在上文中已作说明，同理，历史叙述与历史也不能等同，却还未引起足够注意，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界扯断传统文化之纽带，高扬虚构，那么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割裂传统史学的联系，彰扬科学。结果，中国的独特的受到黑格尔赞美的历史叙述，既失乐于文园，又受贬于史苑，成了文学的丑表妹和历史的蠢表弟。因此，我们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上克服“两个至上”之偏颇，才能真正构建我们中国的纪实叙述学。其次，我们必须具有关于文体的审美价值的清醒意识，纪实与纪虚固然是叙述学的两个分支，但是同为叙述，它们在美学价值上还是可以殊途同归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史记》能被鲁迅先生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原因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一部作品的最后审美判断，不能仅凭它是否纪实抑或虚构。纪实或虚构还不足以决定其作品是否富有审美价值。《史记》不是虚构，但它比虚构的《一件小事》审美价值高。《红楼梦》不是纪实，但它远超于纪实的《铺蛇者说》而成为世界文学名著。再次，我们之所以呼唤构建中国自己的纪实叙述学，是基于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反思。当时的论者引进西方的虚构文学观念是没有错的，事实上，促进并繁荣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创作。但是，由于过多地献身于虚构，反而没有冷静思考我们民族传统的东西。没有完成中国古代纪实叙述的现代转化，而一味屈服于西方话语霸权。结果，中国人用实在的人和事来反思人类命运的历史叙述渴望被压抑或转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积极倡导中国自己的纪实叙述学。

## [参考文献]

- [1]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
- [2] 《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文载《我的留学记》（日本）吉川幸次郎，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年 9 月。
- [3] 吉川幸次郎《纪实与虚构——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未来》。
- [4]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 12 月。
- [5] 赵毅衡《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责任编辑：龙迪勇]